

215597

晋
好大王碑

中華書局
碑帖名品錄

碑帖名品錄 中華書局

晋 好大王碑



准阴师院图书馆1275878

書名：晉好大王碑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香港九龍彌敦道450—452號
北京市文物商店慶雲堂
印刷：雅歷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仔黃竹坑業發街4號15樓
印刷：1985年10月版
版次：©1985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ISBN 962 231 528 3



晋 好大王碑

《好大王碑》，是高句麗第二十代長壽王臣璉爲紀念他父親談德，於公元四一四年（東晉義熙十年、長壽王二年）建立的。雖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但在清光緒初，即一八八〇年前後才被發現。

談德，即好大王，他是高句麗王朝的第十九代王。十八歲襲位，當時稱「永樂大王」。他在位期間，南攻百濟，北侵扶餘，西討碑麗，屢敗倭寇，稱雄於鴨綠江兩岸和漢水以北地區。所以他死後，被謚爲「國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大王」。因此《好大王碑》，又有《永樂大王碑》、《談德紀勛碑》、《廣開土王陵碑》、《平安好大王碑》諸名。

此碑立於吉林省集安縣好大王陵的東側。碑身用巨型角礫凝灰岩略加修琢而成，形制爲不規則的方柱碣狀體，與泰山、瑯琊刻石，漢裴岑刻石，吳禪國山、天發神讖刻石相類，蓋取古碑之遺制。碑高六點三九米，面幅一點三五至二米不等。碑文爲隸書，四面環刻，共四十四行，滿字四十一字，總計一千七百七十五字。分行間有天地及豎綫界格，字徑大小有異，大者約十六厘米，小者約十一厘米，多數在十四至十五厘米之間。碑文記載了好大王談德的征戰功迹，同時對高句麗建國的神話傳說、王位承襲以及好大王「存時教言」，對好大

王墓守墓奴的來源、家數和嚴酷法令，均有詳細記述。是研究歷史的重要資料，因此深受海內外學術界的極大重視，一九四九年以後被列爲國家級重點保護文物。

此碑書法，自然奔放，樸厚雄強，在晉時碑誌中獨辟蹊徑，故自清末發現以來深爲金石家所喜愛和推崇。

但由於它的書體風格與當時通行的工整清麗的隸書，有明顯區別，因此對它的書體所屬，諸家議論紛紜。鄭文焯在《高麗國永樂大王碑釋文纂考》中說它：「字體八八遁渾」；榮禧在《高句麗永樂大王墓碑譏言》中說它：「篆隸相屬兼多省文，古樸可喜，極似魏碑」；而歐陽輔《集古求真·高麗好大王碑》條中則說它：「當晉之

末，真書已傳至高麗，則真書之始於魏晉，益信而有徵，而強以爲始於齊梁者，可以自知其偏執矣」。顯然，他認爲《好大王碑》的書體又屬於真書。從某種意義上說，諸家所論各有一定道理，但若把此碑放在整個漢字書體演變過渡中表現出來的不同書體所特有的結體和筆法特徵這個標準上來衡量，則不難發現，上述說法，都是欠妥當的。筆者認爲，此碑體在篆隸之間，瑰異奇古，凝煉厚重，雖刊於晉世，但取法高古，面貌與西漢《萊子侯刻石》相近，有着明顯的古隸風格，即所謂「減却篆書之繁折爲隸書之勁直」的那種樸厚古茂的隸書。這與

它的碑石造型，採取古制，其意趣都是相互一致，渾然一體的。此碑筆法不事雕琢，高古圓渾，天真質樸，多有周秦篆籀之遺意。字迹方整醇厚，筆畫均勻遒健。起送澀進，筆筆中鋒，雖行款縱橫有疏密不同，字形大小隨意，參差錯落，但筆勢却極相似。它既無「八分」的蠶頭燕尾，也無「真書」的起伏頓挫。顯然，這是秦詔、漢鏡中才能見到的筆法。這種介乎篆隸之間的古隸書風，由於它是處在漢字形體的變改和交替時期，因此在結體與筆法上，往往是轉換使用的。正如我們在此碑中所見到的那樣，體勻筆圓者似篆，勢寬筆直者似隸，簡約隸定者似草。這些轉換變化，或存在於一字之內，或呈露於點畫之間，高古可愛，渾美可喜。這在書法藝術中是難能可貴的。表現了書者的精湛深邃的藝術造詣。

此碑棄置荒野愈千年，迄清末發現時，石已苔蘚封蝕，文字模糊且有剥落，難以捶拓和辨認。後經焚苦，再將字的輪廓用墨輕輕拓出，然後把紙取下，再在空隙和無字處塗墨，即所謂「就石鈎勒，才可辨字」。這種

拓本，字口清晰，但書迹失真，意趣索然。如潘祖蔭、吳大澂等藏本，即屬此類。張延厚在《好大王碑跋語》中說：「清光緒初，吳縣潘鄭蓋（即潘祖蔭）尙書始訪得之，命京師李大龍裹糧往拓，歷盡艱險得五十本，一時貴遊，爭相購玩」。據此可知，李大龍所拓，很可能就是這種雙鉤加墨本。

光緒中晚期拓本，主要有兩種。一種即是葉昌熾《語石》中所說的「乙酉……其後」（按吳重熹《高句麗永樂大王碑釋文纂考後跋》，知其具體時間在己丑，即光緒十五年），碑佑李雲從（即李大龍，由盛伯義鳩資再遣）裹糧挾紙墨，跋涉數千里，再往返，始得精拓本。這種拓本，爲皮紙淡墨。每面分四段拓，共十六紙。字口豐腴。另一種即是談國桓《手札》中所說的：「嗣後（即甲午之役後），吳清卿中丞亦屬家君再拓，思用宣紙，竟未如願，以著碑，紙即破碎，乃用單高麗紙拓得數本」。這種拓本，爲鍋烟濃墨。每面整幅拓，共四紙。紙地堅韌，墨色醇古，字口朗潔，比較真實地再現了碑石文字的原貌，向爲金石家視作珍品。

現此印本即以光緒中期單高麗紙本影出。經與其它同時善本校勘，大致和王孝禹藏本、朝鮮總督府藏本以及日人內藤虎次郎藏本相同。據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

云：「舊拓本，二行「巡車」之「車」字完好」。筆者未曾見之。按此本，該字雖右半已損，但據左半可辨之筆道尋識，可以發現，明顯不是「車」字，而是「幸」字。幸字古寫多作「幸」，下爲三橫，與此碑同。因此按碑文，應是「巡幸南下」。此字，榮禧釋爲「即」；劉承幹、羅振玉、楊守敬、金毓黻、朴時亨、今西龍、前間恭作、末松保和均釋作「車」，惟日人水谷悌二郎釋爲「幸」。據此可證，水谷悌所釋是正確的。

此碑拓本，尚有民國十年穆氏宣紙本傳世，雖著字處紙破痕多有顯露，然其書神尚可觀。而近拓張明善、周雲卿本則徒存匡廓，了無神明。蓋石經年摩挲，元氣已失，廬山眞面誠難再覩。故似此舊拓，其珍秘寶貴可知。

泰公























